

# 馬若瑟《漢語劄記》的抄本 和刊本新探

柯保羅\*

## 摘要

來華法國人耶穌會士馬若瑟於十八世紀初完成《漢語劄記》一書，希望透過它的刊行協助歐洲傳教士及知識分子學習漢語。可惜此願望要遲至一個世紀後才終於實現。多年來中外學者研究《漢語劄記》的各種原稿本、重抄本和刊行本，在不同範疇裡發表相當數量的文章及專著。透過檢視現藏於歐洲三個圖書館裡的抄本、先後於亞洲三個城市裡印刷的刊本以及相關史料，本文比較抄本和刊本的內容及探討該書重抄面世以至出版流傳的歷史脈絡，提出一些不見於現有學術研究的資訊和推論或有別於當今學術論述的結論和觀點，供對此課題有興趣的學者們參考。

**關鍵詞：**馬若瑟、《漢語劄記》、儒蓮、諾依曼、馬禮遜、英華書院、  
稿本與版本研究

---

2020年3月31日收稿，2020年7月16日修訂完成，2021年1月20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旅歐獨立學者，兼任香港大學歷史學系附屬助理教授。

## 一、前 言

《漢語劄記》（*Notitia Linguæ Sinicæ*）的撰寫者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在 1666 年 7 月 17 日於法國出生，於 1683 年 9 月 17 日加入耶穌會。他在 1698 年 3 月由法國羅謝爾（La Rochelle）登船出發，途經好望角、馬六甲、上川島和澳門等，於 11 月初到達廣州，開始他三十餘年的宣教事工，主要在江西工作。康熙晚年因所謂中國禮儀之爭而下令教禁，但馬若瑟當時幸免。雍正登基後秉承父皇之意，嚴厲執行此旨，在 1724 年把馬若瑟和許多天主教傳教士流放至廣州，然後再於 1732 年把他們驅逐往澳門。馬氏在十多年的流放生涯後，於 1736 年 9 月在葡屬澳門逝世，終其一生沒有再踏足中國內地。

馬氏入華時已 32 歲，完全不懂中文，曾形容自己其時「口吃目瞽，一字不識，一言不出」。<sup>1</sup> 多年後，他在宣揚福音與索隱解經兩大動機的推動下鑽研中國語言和遍讀儒家經典，終於精通兼且熱愛漢語，稱中國文字比歐洲語言「更易學，更高尚，更通用，更有條不紊」（plus aisée, plus noble, plus universelle, & plus méthodique）。<sup>2</sup> 馬若瑟翻譯《趙氏孤兒》全本及《書經》和《詩經》節錄等，向歐洲讀者推介中國文學和經書。他亦透過《六書實義》、《儒教實義》和《經傳眾說》等向中國讀者闡述中文古籍中與天主教教義互相呼應的片段，為他與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等共創的索隱派（figurism）之宣教事工努力。

但不少論者認為他在流放時期完成的《漢語劄記》才是他最具影響力的作品。法國漢學家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十分推崇此書，更尊稱馬若瑟為來華宣教士中居首位之漢語學家，說其他人

1 (法) 馬若瑟，〈作者自序〉，《經傳議論》，頁 1，MS Chinois 7164,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2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Paris: Nicolas Le Clerc, 1729), 19:463. 除直接引用他人譯文外，外文資料之中譯由作者提供，且會盡量意譯而非直譯。如引用資料罕見、原文複雜難譯或有其他需要時，文本或附註會引述原文以供參考。

如錢德明 (Jean Joseph Marie Amiot)、韓國英 (Pierre Martial Cibot)、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衛方濟 (François Noël) 和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 等之「中文造詣均不能望其項背」。<sup>3</sup> 早期歐洲漢學家傅爾蒙 (Étienne Fourmont, 1683-1745)、雷慕沙和考狄 (Henri Cordier, 1849-1925) 等為後世研究《漢語劄記》者提供大量一手和二手資料。近年中外學者亦發表了不少有關該書在稿本學、刊本學、語言學、修辭學、索隱思想和語言習得等方面的研究，其中龍伯格 (Knud Lundbæk) 和李真的著作有對《漢語劄記》各種稿本和刊本較全面的論述。<sup>4</sup>

馬若瑟的《漢語劄記》是十九世紀以前歐洲知識分子中最重要的漢語書籍之一，本文會重新審視三份《漢語劄記》的歐洲抄本，三本亞洲刊本和相當數量的一手及二手史料，為上述抄本和刊本的內容及歷史提供一些資訊、看法與推論。這些部分與過去上述學者的主張與結論明顯不同，部分則補充他們論述裡現存的空白。在本文裡，抄本的定義是第三者後來根據作者撰寫及他指定抄者抄寫的「原始稿本」而複製的稿本。馬若瑟《漢語劄記》的原始稿本大約在 1728 年完成，現存有兩份文本不完全相同的稿本，分別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大英圖書館，它們當然重要，但並非本文的研究目標。<sup>5</sup> 第一代抄本於 1810 至 1840 年代在歐洲複製，可

3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ou Recueil de morceaux de critique et de mémoires, relatifs aux religions, aux sciences, aux coutumes, à l'histoire et à la géographie des nations orientales* (Paris: Schubart et Heideloff, 1829), 2:262. 原文：“[...] n'ont pas égalé Prémare pour la connaissance approfondie de la langue chinoise.”

4 Knud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660-1736)*, S.J.: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Aarhus,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 李真，《馬若瑟《漢語劄記》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李真，〈馬若瑟語言研究代表作《漢語劄記》之版本流變考〉，《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2013): 118-123；李真，〈馬若瑟 (Joseph de Prémare, S.J.) 生平、拉丁語漢語語法書及學術成就鉤沉〉，《拉丁語言文化研究》第 1 輯，2013，頁 58-101；李真，〈德國巴伐利亞公立圖書圖書館藏《漢語劄記》抄本述略〉，《國際漢學》18(2019.1): 178-184。

5 關於此書原始稿本的背景資料可參考 Paul Kua, “Prémare's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1728-1893: The Journey of a Language Textbook,” *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10, no. 2 (October 2020): 159-200.

以被統稱為「歐洲抄本」，它們是此書的第一波流傳。接著，不同刊本從 1831 至 1893 年三次於不同的亞洲城市出版，可以被統稱為「亞洲刊本」，它們分別是此書的第二、第三和第四波流傳。本文會專注討論歐洲抄本和亞洲刊本的歷史脈絡和文本異同。

## 二、歐洲抄本

### (一)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藏本

原本學醫的雷慕沙在偶遇一本中草藥古籍後成功自學中文，於 1814 年被委為法蘭西公學院（Collège de France）之首任漢滿語言及文學教授。馬若瑟《漢語劄記》的一份原始稿本從十八世紀初入藏巴黎皇家圖書館後就被遺忘，直到 1810 年代才給雷氏無意中重新發現。此原始稿本今仍由皇家圖書館的繼承者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有，編號為 Chinois 9259，本文有時會簡稱其為「法圖藏本」。雷慕沙找到此稿本後獲准抄寫一份複本，這可以被稱為第一份歐洲抄本。接著，雷慕沙把消息「告知大約二十位正在法蘭西公學院學習」的漢語學生，「他們趕快地複製了一些完整或不太完整的拷貝」，<sup>6</sup>使此書在西方知識分子圈裡獲得一定程度的流通。這第一波流傳相當緩慢而狹窄，只係透過需要花大量時間和精力去複製兼而常常出錯的抄本流傳。

雷慕沙的其中一位比較優秀的學生儒蓮（Stanislas Aignan Julien, 1797-1873）曾不止一次複製這種抄本。雷氏透露他在 1825 年曾委託儒蓮根據第一份歐洲抄本複製稿本，並說由他編製而不見於原始稿本的「索引在這第二份抄本中亦再次出現」。<sup>7</sup> 抄寫時儒蓮遵循龍伯格聲稱為雷慕沙的「不恰當之純粹主義」，<sup>8</sup>把中文字按漢語慣例從右向左抄寫，與原始稿本

6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auctore P. Premare,” *Journal Des Savants* (September 1831): 537-45.

7 Abel-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2:273. Note 2: “[C]et Index a été répété dans la deuxième copie.”

8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79.

裡中文的行文方向背道而馳。這顯然不是儒蓮慣常的做法：在他於 1824 年刊行的《孟子》一書裡，中文與外文同樣是由左到右排列。<sup>9</sup>雷慕沙對中文行文方向的堅持不能說是不對，但卻使閱讀《漢語劄記》的雙語文本變得尷尬，因為每次文本更改語言時，讀者都必須切換閱讀方向。

這本歐洲抄本很關鍵，因為它是《漢語劄記》得以廣泛流傳的橋樑，下文會稱它為「儒蓮抄本 A」。考狄曾檢視過此本在十九世紀末由漢學家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擁有的抄本，並在《中國書目》（*Bibliotheca Sinica*）裡作出有關論述。<sup>10</sup>但不知為何，近代學者包括龍伯格和李真雖然有複述考狄的資料，卻無提及此抄本現況。龍伯格只說「時為雷慕沙學生的儒蓮」被要求抄寫稿本，而李真 2019 年的文章附有「《漢語劄記》存世各類版本一覽表」，列出所有原始稿本、抄本和刊本，卻不見用於印刷首刊本的「儒蓮抄本 A」，顯然不知此稿本仍然存世。<sup>11</sup>

「儒蓮抄本 A」並無隨時間而淹沒，現存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檔案館，編號為 CWML MSS 300。查閱此重要稿本可以印證考狄的論述，更能發現其他值得探討的稿本流傳細節等。在「儒蓮抄本 A」第一個有字的頁面（該頁沒有頁碼）有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親筆書寫的出處說明：

此語法書由「一位紳士」通過校監馬禮遜博士贈送給英華書院。校監代表書院接受委托利用上述紳士提供的資金印刷此語法書。倫敦，語言學院……1826 年 2 月 15 日。<sup>12</sup>

9 Stanislas Aignan Julien, *Meng Tseu vel Mencium, inter Sinenses philosophos, ingenio, doctrina, nominisque claritate Confucio proximum* (Paris, 1824), 65-84.

10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 vol. 3, fascicle 1 (Paris: Librarie Orientale and Américaine, 1906), columns 1665-1666. 此書多被譯為《西人論中國書目》，與原書名不符，本文會簡稱之為《中國書目》。它並無頁數，每頁有兩欄，均附有編號。

11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79; 李真，〈德國巴伐利亞公立圖書圖書館藏《漢語劄記》抄本述略〉，頁 179。

12 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Notitia Linguae Sinicæ* (Paris, 1825), CWML MSS 300,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hereafter SOAS) Library, London. “[T]his Grammar is presented to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through the President Dr. Morrison,

稿本第二頁（亦無頁碼）有三段文字，馬氏在中間那一段說「此語法書為馬六甲英華書院所有。1826年2月15日」，基本上只是重複上頁資訊，考狄也有提及。但寫於該頁底部而《中國書目》裡沒有引用的第二段文字卻值得注意，它聲稱「倫敦會的歐德禮（Ernst Johann Eitel, 1838-1908）牧師贈送給偉烈亞力，香港，1870年」。<sup>13</sup>此段文字有助理解「儒蓮抄本A」的流傳，相當重要，不知為何考狄卻選擇略過。根據這句話，我們終於明白為何原屬英華書院的「儒蓮抄本A」會落到偉烈亞力手裡。英華書院於1843年在校長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博士的領導下從馬六甲遷往剛成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卻在1850年代末因種種問題停辦，校產由其主辦機構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接管，而1870年歐德禮牧師正是香港倫敦會的負責人。

偉烈亞力與《漢語劄記》一書早年有一段緣：早於1846年理雅各回英小住時，仍未加入倫敦會的偉烈亞力就曾手持介紹信來拜訪他，告訴理雅各：

在去年冬天，（我）在一舊書攤上找到一本馬若瑟的《漢語劄記》。  
（我）曾學過拉丁文，看得懂該書，對它很感興趣，並希望可以得到關於學習中文的一些指導。

根據理雅各的回憶，他即場向偉烈亞力展示一本中文《新約全書》，而後者居然可以「差不多準確地讀出一兩行，並把它們翻譯出來」。偉烈亞力說他當時只有馬六甲的《漢語劄記》刊本和一本聖經公會的《新約》，既沒有中文老師，也沒有任何中文字典。因此，理雅各對他印象深刻，決定教他中文，並預言在有利條件下，後者「將會在漢學領域裡大有作為」。<sup>14</sup>（歷史證明，偉烈亞力並沒有讓理雅各失望，但這是後話）。所以，

by ‘a Gentleman’. The President engages on the behalf of the College to have this Grammar Printed from Funds provided by the gentleman aforesaid. London, Language Institution [...] Feb. 15, 1826.”

13 Prémar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Paris, 1825). “Given to A. Wylie by Rev. E. J. Eitel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Hong Kong, 1870.”

14 Henri Cordier,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Alexander Wylie,” in *Chinese Researches*, ed. Alexander Wylie (Shanghai, 1897), 8-9.

在二十多年後，已身為倫敦會傳教士的偉烈亞力在香港看見他學習中文啓蒙書籍之原稿時，對它興趣濃厚並不稀奇。當然我們仍可質疑歐德禮是否有權把倫敦會接收而原屬英華書院的稿本轉贈偉烈亞力，不過這個問題顯然已超出本文討論的範圍。

第一頁沒有編號的頁面背面還有另一行不曾出現在《中國書目》裡的文字如下：「偉烈亞力致他親愛的朋友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後面並無日期。<sup>15</sup> 偉烈亞力在 1882 年將他的中文藏書賣給牛津大學圖書館，但顯然沒有把這本稿本賣掉，而是將它轉送同屬倫敦會和第一位進入北京的醫療傳教士雒魏林。根據亞非學院檔案館的資料，這份手稿後來和雒魏林其他的藏書一起被捐給倫敦會。在 1966 年和 1972 年倫敦會相繼與兩個傳道會合併為世界傳道會（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其後更在 1977 年重組。從 1973 年開始，世界傳道會把該會大量信件、檔案、刊物和稿本等以「無限期借出」（indefinite loan）的形式轉移給學院檔案館，「儒蓮抄本 A」也在此時入藏檔案館。

透過此稿本這些簡短的幾行文字，我們終於可以確定「儒蓮抄本 A」從 1825 年完稿至如今的整段出處及流傳歷史。這些資料都來自稿本前端兩頁沒有編號的頁面，但這些文字考狄卻無提及，再次證明細心檢視原始資料而不是單靠二手資料（包括如《中國書目》這種小心編纂和資料詳盡的參考書籍）之重要性。

亞非學院所藏的「儒蓮抄本 A」抄自雷慕沙抄本，但此抄本已不知所蹤，所以有關比較只能夠參考後者的母本，現藏於法國圖書館藏的原始稿本。《漢語劄記》的文本有緒論 “Introductio”、第一部 “Pars Prima” 和第二部 “Pars Secunda” 三大部分，每部分各有若干章 caput，每章再細分為 articulus、paragraphus 以至 numerus 等，本文將會把此三個不同層次的細分譯為篇、段和號。洋式訂裝的「儒蓮抄本 A」只有一個頁碼系列，從首頁開始在每個跨頁（spread，左右兩頁）的左、右上角寫上頁數，由第 1 至第 386 頁，然後是一份沒有編號而筆跡不同的索引。除了頁碼，抄本跨

<sup>15</sup> Prémar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Paris, 1825). “[F]rom A. Wylie to his dear friend W. Lockhart esq.”

頁的左邊界（left margin）和右邊界（right margin）還加上一些更詳細的分段編號，這應是雷慕沙的創舉，因為法圖藏本並沒有這種號碼。此抄本由緒論共三章（第 1-51 頁），講解白話文的第一部共兩章（第 52-213 頁）和論述文言文第二部共五章（第 215-386 頁）組成。第 386 頁底部有三行拉丁文，聲明「此漢語語法著作稿本由儒蓮抄寫」（Hunc linguae Sinicae grammaticam è codice manuscript excripsit Stanislas Julien）。在該頁的左下角還有幾行寫於 1825 年 8 月 25 日的說明，聲稱稿本複製是「辛勤勞動 600 小時之後」（[...] as post 600 assidui laboris horas [...]）完成的，可見抄寫工作之艱巨。

「儒蓮抄本 A」與法圖藏本最大的分別係前者多了一份索引。在前面提及第二頁未編號的頁面之上端，雷慕沙（該處只簡寫為 J. P. A. R.）用法文注明該抄本「附索引卡片十包」（[...] avec Dix paquets de cartes, contenant l'Index），顯示他編製的索引原來並非一份稿本而是一套卡片。然而現存稿本並無這些卡片，而是在文本後有共二十四頁而每頁有兩欄的索引，與雷氏的說法有異。這個問題的答案在索引尾頁的左下角，因為該處的法文註釋確認索引文稿是博斯偉（Richard Boswell）於 1826 年 3 月 20 日「從卡片轉錄而成」（[...] L'Index transcrit des carte [...]）的。<sup>16</sup> 考狄在書目裡有抄寫上述兩段文字，但並無解釋兩者之邏輯關係以及博斯偉為何人。原來馬禮遜為鼓勵國人學習漢語，回英後曾開辦語言學院，而博斯偉是學院學生和兼職的會計和副秘書。他顯然是被馬氏委託把索引卡片轉換為一份連續的索引，以便將來排版之用。這也解釋了為何稿本的文本和索引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筆跡。

儘管此抄本曾被雷氏譽為「非常精確之拷貝」（une copie très exacte），<sup>17</sup> 它與法圖藏本仍有一些差異。這裡只舉幾個例子。法圖藏本在第一部另起頁碼第 6 頁的書名《玉嬌梨》之後有幾行文字被劃掉，但仍清晰可辨。在「儒蓮抄本 A」可比頁面即 54 頁裡，儒蓮遵循雷慕沙抄本的做法，在書名後加上 \* 標，並在該頁底部以腳註寫出被劃掉的文字，變相

16 Ibid.

17 Abel-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2:273.

恢復了被淘汰的文本。<sup>18</sup> 法圖藏本第一部結尾的諺語沒有任何編號，但在「儒蓮抄本 A」裡，所有諺語都有編號，便於查閱，是個好的改動。這很可能也不是儒蓮的創舉，而是雷慕沙抄本裡已採用的做法。兩個稿本的編頁也不同：法圖藏本第一部第二章尾頁是 314 頁，但「儒蓮抄本 A」同一段的尾頁卻是 213 頁。「儒蓮抄本 A」的文本還有一些錯漏，由於需要與首刊本比較，會在下一節再談。

## (二) 大英圖書館藏本

除「儒蓮抄本 A」外，我們還知道起碼兩份歐洲抄本的下落，它們都只是第一波流傳的產品，與接下來的幾波流傳沒有關係。比較知名的是現存大英圖書館，編號 O/C ADD. 11708 的抄本。此稿本由圖書館之前身大英博物館「於 1840 年 4 月在巴黎的克拉普羅特（藏品）拍賣裡購得」，稿本書脊上標有「由儒蓮抄寫」(Transcript Per Stan. Julien) 幾個法文字。克拉普羅特 (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 又名柯恆儒，在德國柏林出生，是「德國首位東亞研究教授（波恩，1816）」。他以研究為由，獲准長居巴黎，多年來對語言學、歷史學、民族學和東方學等均有貢獻，當年與雷慕沙同是歐洲開拓東亞研究的泰斗。<sup>19</sup>

這份歐洲抄本有兩個頁碼系列，第一系列從第 1 頁順序至稿本尾頁，但從第二部開始基本上每個跨頁才寫一個頁碼在右上角，這應該是後來收藏者（柯恆儒/大英圖書館？）的編碼。由於此稿本有字的尾頁是左頁，所以它最後標有頁碼的是前一頁第 488 頁。第二個系列的頁碼從第二部即第一系列第 96 頁開始出現，以該部首頁為第 1 頁至第二部即稿本尾頁為第 394 頁，基本上每頁都寫上頁碼，這應該是原抄者的編碼。換句話說，此稿本最後有字的尾頁是第一系列的第 489 頁（沒有標明），等於第二系列的第 394 頁。本文會引用由頭到尾都出現的第一系列頁碼。

18 注意在馬六甲刊本同樣的腳註出現於 39 頁。

19 Hartmut Walravens,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 Leben und Werk* (Wiesbaden, Germany: Harrassowitz Verlag, 1999), ix. 克拉普羅特後來很多作品均為法文書，經常只以 Julius Klaproth 署名。

此抄本並不完整，只存緒論三章（第 3-90 頁），第一部幾頁（第 91-95 頁）和第二部五章（第 96-489 頁）。換句話說，它基本上只有緒論和第二部，因為它只有第一部幾頁的簡介。它偶然也有錯漏。舉例：第二部第四章被錯標為第五章（*caput quantum*，第 301 頁），但其下仍是第四章的內容。同樣標題再次出現於正確的第五章首頁（第 448 頁），使稿本表面看來似乎有兩個第五章。儘管此抄本不含第一部，但由於文本佈局比「儒蓮抄本 A」寬敞，它卻長達 489 頁，比文本完整的後者多了整整一百頁。

考狄在《中國書目》裡聲稱雖然柯恆儒和大英圖書館均認定這份重抄本是儒蓮的抄本，「我們相信這是雷慕沙的」（*nous croyons qu'elle est d'Abel-Rémusat*），但無提出任何論據。<sup>20</sup> 李真指出此稿本的中文行文方向和拉丁文同是從左到右，與「儒蓮抄本 A」做法相反，因此推論大英圖書館的這份手稿「不太可能出自儒蓮之手，考狄推斷為雷慕沙之抄本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亦承認需要進一步研究。<sup>21</sup> 在後來刊行的文章裡，她再把此稿本的抄寫者暫定為「儒蓮/雷慕沙」，並解釋說：「因為目前尚沒有新的史料出現，故此抄本作者及製作時間暫存疑」。<sup>22</sup>

考狄對於稿本抄寫人的推論很難成立，李真以中文行文方向為佐證亦欠缺說服力。來自不同文獻包括考狄在書目其他地方的論述均顯示此說法自相矛盾。首先，「儒蓮抄本 A」的母本係雷慕沙抄本，所以前者的中文從右至左的行文方向是跟隨雷氏的修改，而不是法圖藏本的做法或儒蓮的習慣。其次，波蒂埃（Jean 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 1801-1873）證實雷慕沙的《漢語劄記》抄本早在 1833 年已與他的其他藏書一起被賣掉，然後在 1862 年又再次被轉售，<sup>23</sup> 但大英博物館卻是在 1840 年拍得上述抄本，兩者時間的差距顯示後者不可能是雷慕沙抄本。再者，考

20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vol. 3, fascicule 1, column 1668.

21 李真，《馬若瑟《漢語札記》研究》，頁 77。

22 李真，〈德國巴伐利亞公立圖書圖書館藏《漢語劄記》抄本述略〉，頁 179。

23 Jean Pierre Guillaume Pauthier, “*Vindiciae Sinicæ Novæ.*” N° 1 (Paris: Ernest Leroux, 1872), 12. Note 1: “L'exemplaire de la copie que M. Abel-Abel-Rémusat avait Faite [...] est porté au catalogue de vente de sa bibliothèque (qui eut lieu en 1833) [...] Cette même copie s'est retrouvée à la vente des livres de feu Landresse (faite en 1862).”

狄於二十世紀初刊行的書目裡也聲稱「雷慕沙抄本今天屬羅尼（Léon de Rosny, 1837-1914）所有」。<sup>24</sup> 羅尼出生於 1835 年，所以他購入稿本的年代應該是在 1840 年之後，但此抄本在 1840 年已入藏大英博物館，兩者不可能是同一份手稿。還有，考狄亦說「雷慕沙的抄本裡中文係從右至左而行的」（Copie faite par Rémusat [...] les caractères chinois écrits de droite à gauche），<sup>25</sup> 但英圖館藏的這份手稿裡的中文卻是從左至右書寫的。

所以，根據雷慕沙、波蒂埃、考狄以至儒蓮本人的文獻，把大英圖書館現存編號 O/C ADD. 11708 的抄本認定為雷慕沙抄本不能自圓其說。當然，史料分析需要輔以筆跡比較。本文把三份歐洲抄本的手跡比較放在史料討論後，比較顯示此大英圖書館稿本應該如圖書館目錄以及抄本書脊上所示，也是一份儒蓮抄本。而且，它並無雷慕沙抄本裡左右邊界的分段編號，很可能是後來直接抄自從法圖藏本的。儒蓮在 1832 年雷慕沙逝世後被委任為法蘭西公學院的第二任漢滿語言及文學教授，更在 1839 年成為皇家圖書館漢文圖書的管理員。所以，雖然他在當學生的時代只能夠使用雷慕沙抄本複製重抄本，他後來的確是有機會接觸皇家圖書館的原稿的。換句話說，這份抄本很可能是在 1830 至 1840 年完成的。由於大英圖書館的這份抄本完成年度應該比「儒蓮抄本 A」遲，本文會把它標為「儒蓮抄本 B」。

順帶一提，很少人知道的還有第三份的儒蓮抄本。這份「完全由儒蓮抄寫的對開本」（in folio entièrement de la main de S. Julien）稿本附有法國漢學家德理文侯爵（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 1822-1892）的手寫藏書卷，現由私人收藏家擁有，最近曾經透過一個知名的古籍商求售。<sup>26</sup> 考狄在《中國書目》裡有提及這份抄本，當時它仍在德理文手上。<sup>27</sup> 當這份抄本於 2019 年在市場出現時本文筆者曾透過書賈詢問可否向收藏者取

24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vol. 3, fascicule 1, column 1666.

25 Ibid., column 1665.

26 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Notitia Linguae Sinicæ* (Paris, ca. 1830s), <https://douglasstewart.com.au/product/premari-notitia-linguae-sinicæ> (accessed 2019.07.18). 與此書有關的資料和圖片近來已經無法再在該網站看得見。

27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vol. 3, fascicule 1, column 1666. “2e Copie fait par S. Julien.”

得更多資料以便分析，但得到的答覆是「收藏者年邁，不便打擾」，錯過了一次深入瞭解此稿本的機會。我們可以把這份法國抄本標為「儒蓮抄本 C」，但由於沒有更多的資料，本文不會再討論它。

### (三) 巴伐利亞圖書館藏本

本文討論的最後一份歐洲抄本現存於德國慕尼黑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編號 Cod. Sin. 1, [Guangzhou] 1830。此抄本一些頁面上蓋有慕尼黑皇家圖書館 (Bibliotheca Regia Monacensis) 圖章，顯示它是在 1919 年該館易名前入藏的。在現階段，本文會簡稱此稿本為「德國抄本」，但下文會因應史料分析的結果再提出另一名稱。此稿本首頁書名下方標有「1830」年，並無標明廣州，但圖書館目錄卻於編號以括號加上廣州 (Guangzhou) 的字眼。考狄的書目有提及這份抄本，只有寥寥數語，認為此稿本與馬六甲刊本內容相同，「毫無特點」(san intérêt)。<sup>28</sup> 事實上，這份抄本從流傳歷史的角度來看肯定是有研究價值的。

德國抄本只有一個頁碼系列，用墨水筆從第 1 頁標至第 197 頁，分別寫在每個跨頁的左、右上角，第 198 頁是空白的。和「儒蓮抄本 A」一樣，此抄本同樣有一些比頁數更詳細的分段編號，顯示它的母本很可能亦是雷慕沙抄本。再者，此稿本夾有一份沒有和文本釘裝在一起的目錄與索引，有後來以鉛筆寫上的頁碼，從第 199 頁至 226 頁。此稿本同樣有緒論三章(第 1-15 頁)，第一部兩章(第 16-95 頁)和第二部五章(第 96-197 頁)。抄本的中文從右至左書寫而文本後附有索引，這些和「儒蓮抄本 A」相同。但抄本多了兩頁目錄，這是「儒蓮抄本 A」沒有的。

在緒論裡，德國抄本有些個別的刪節，尤其是第三章裡篇幅頗長的九個韻母字表，每個列出大量各類的同韻字，包括它們的拼音，漢字和簡單解釋。但德國抄本的抄者說「我認為無需抄寫它們」(eum trancibere non mihi videtur)，把所有列表簡省掉，沒有列出任何中文字、拼音或解釋。<sup>29</sup>

28 Ibid., column 1668.

29 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Notitia Linguae Sinicæ* (Canton: 1830), 12, Cod. Sin. 1, [Guangzhou] 1830,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

因此，「儒蓮抄本 A」緒論第三章共有三十三頁（第 19-51 頁），但德國抄本卻僅僅有三頁（第 12-14 頁）而已。

在第一部兩章裡，除頁數不同外，德國稿本和「儒蓮抄本 A」的內容基本相同。但在此部結尾，德國抄本加進一段文字，表明「馬若瑟神父言此部有三章」，包括第三章中國禮節的兩類內容，並說雷慕沙抄本並無此章，不知是否他在抄寫時將其刪掉或馬若瑟的原稿就沒有（第 98 頁）。注意這段說明並無錄入該章的任何具體內容，它只是幾乎一字不改地抄自傅爾蒙的《中國官話》（*Linguæ Sinarum Mandarinicæ*）裡對這一章的簡介。<sup>30</sup> 這裡有關雷慕沙是否在抄寫時把第三章刪掉的猜測亦可以被否定，因為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漢語劄記》原始稿本的第一部只有兩章，並沒有講解中國禮節的第三章。

在第二部的五章裡，「德國抄本」和「儒蓮抄本 A」的內容也大多一樣。「德國抄本」有些段落會只寫上拼音而省卻漢字。舉例：第三章首頁（第 128 頁）只有拼音 “kou ven”、“y chi et chu” 和 “chan-hai-king” 而欠漢字「古文」、「易、詩、書」和「山海經」等。「儒蓮抄本 A」第二部第四章第六段尾部有拉丁文和中文對照的《天主總論》，但可能是抄者時間倉促，「德國抄本」裡只有拉丁文文本及預留了四頁空白頁面（第 167-170 頁），想來是方便將來補上中文之用。

李真在 2019 年發表一篇專門研究「德國抄本」的文章，詳細討論這份鮮為人知的歐洲抄本，提出以下結論：

抄本的作者為法國漢學家儒蓮，1825 年 10 月 7 日在巴黎完成抄寫工作。該抄本所用底本為雷慕沙的抄本。儒蓮在抄寫過程中對馬若瑟原書做了少許調整和刪節，並加上了自己編寫的目錄和索引。<sup>3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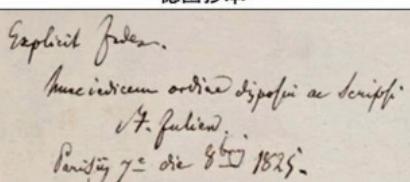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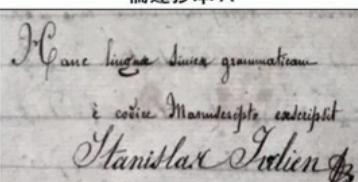
30 Ibid, 98. “Pater Prémari huius partis tria esse capita dicit [...] ut quae dicta erant ad proxim reducantur, 1. Varios urbane loquendi modos cum ordine colligam; 2. Aliquot dialogos vel historiolas humili stylo scriptas afferam [...].” 此段除了把現在式的“sunt”改成過去式的“erant”外，幾乎全來自 Étienne Fourmont, *Linguæ Sinarum Mandarinicæ hieroglyphicæ grammatica duplex, Latinè, & cum characteribus Sinensium [...]* (Paris: Lutetiæ Parisiorum, 1742), xix.

31 李真，〈德國巴伐利亞公立圖書圖書館藏《漢語劄記》抄本述略〉，頁 184。

第一、第二和第五點亦即該文最重要的結論建基於德國抄本索引結尾的一小段拉丁文。根據該文作者的解讀，這段文字是“Explicit Julien. Hunc indicem ordine disposui ac scripsi. St. Julien. Parisiis 7a die 8bris 1825”；而她提供的參考譯文是「儒蓮就此擱筆。這個目錄是我整理和寫下來的。儒蓮，1825 年 10 月 7 日，巴黎」。再者，該文說因為抄本的目錄及索引和主體文本筆跡相似，所以「可以基本推論出抄本也是由儒蓮本人完成的，正文完成時間應還早於 1825 年 10 月 7 日目錄完成的時間」。<sup>32</sup> 至於第三和第四點的結論則來自德國抄本的文本，包括漢字行文方向和緒論第三章的刪節等，與抄寫者到底為何人沒有直接關係，這裡不詳談。

上述結論值得商榷，因為它們首要論據—索引結尾之說明—的解讀有些問題。「儒蓮抄本 A」是儒蓮親筆抄寫的，而且於 1825 年 8 月抄寫完畢。「德國抄本」的封面標明 1830 年，而索引尾部則提及 1825 年 10 月，基本上與「儒蓮抄本 A」同時期完成。如果後者亦係儒蓮所抄，考慮兩者之母本都是雷慕沙抄本而抄寫時間基本相同，它們的手跡應該相當接近。表一列出德國手稿索引尾頁的幾行字和「儒蓮抄本 A」文本尾頁的幾行字以供大家參考：

表一 兩份歐洲抄本尾頁說明

德國抄本	儒蓮抄本 A
	

資料來源：Cod. Sin. 1, [Guangzhou] 1830,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 CWML MSS 300, SOAS Archives, 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 London.

32 同上註，頁 181。

相信如果李真有看過表一右邊「儒蓮抄本 A」的這一页，她也不會得出「德國抄本」乃另一份儒蓮抄本的推論。很明顯地，左方的文字包括第三行儒蓮兩字（St. Julien）並非他的字跡，因為它們實在與右方文字尤其是第三行儒蓮的簽名相差太遠，不可能出自同一個人。再者，夾在「德國抄本」封底的目錄和索引雖是一份獨立文件，它與文本的字跡的確如李真所說十分相似，很可能是出自同一抄寫者。換句話說，既然目錄和索引的抄寫者不是儒蓮，那麼「德國抄本」的抄寫者顯然也另有其人。

但讀者可能會問那麼為何儒蓮的名字會出現於「德國抄本」上呢？要解決這個合理的疑問我們先要理解「德國抄本」這幾行字的真正意義。這四行字有三句話，各有句號。第一句只有兩個字，第二句有兩行共有八個字，最後一行是第三句。最少字的第一句是最難解讀的。李真誤讀了其中一個關鍵字：第一行第二個字不是“Julien”，第三行第二個字的確是“Julien”，而它明顯和第一行第二個字不同。小心辨讀就會發覺第一句應該是“Explicit Index”才對。注意「德國抄本」裡的大寫“I”和“J”有時候的寫法會完全相同（見索引第 209 頁左欄第二十條“Infinitivum”的“I”和第二十六條注音“Jo”的“J”）。<sup>33</sup> “Explicit”是拉丁文古籍末頁常見的字，顯示文本已終結，接下來通常會有一段書末說明（colophon）。“Index”或索引一字原是拉丁文，原意包括「指出的人、指示、標誌或食指」等。英文的“Index”直接從拉丁文引進，它的眾數“Indices”亦和拉丁文拼法相同，近年來才逐漸被英文化的眾數“Indexes”取代。“Explicit Index”這句話不是「儒蓮就此擱筆」，而且根本完全與儒蓮無關。在這個語境裡合理的意譯可以是「索引完成」或「索引抄寫完畢」之類。

接著的兩句話，亦即「德國抄本」這一段文字的第二行至第四行，是這份索引手稿的末頁說明。這兩句話比較容易理解，可譯為「此索引由（我）儒蓮在 1825 年 10 月 7 日於巴黎排列，分配與抄寫」（ordina, disposui ac scripsi）。這句以第一身寫的話顯然是直接抄自儒蓮原來的索引。如果不知底細，這句話看來顯得有點奇怪。抄寫沒有問題，但為什麼要「排列、分配」呢？不過，如果記得雷慕沙索引原本只是「卡片十包」，

33 Prémar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Canton: 1830), 209.

那麼這句話就變得相當合理，因為排列和分配超過一千多張卡片的確是抄寫索引之前必需經過的步驟。

儒蓮在 1825 年 8 月完成「儒蓮抄本 A」之後，在沒有把稿本交給雷慕沙之前，趁機利用老師的卡片複製一份索引稿本並不奇怪，他的同學或朋友再重抄這份有用的索引亦相當正常。也就是說，「德國抄本」索引最後這句話應該被解讀為該索引是從儒蓮在 1825 年根據卡片整理而成的索引重抄的，並沒說這份索引甚至整份「德國抄本」的抄寫者是儒蓮，或它的抄寫日期是在 1825 年。

即使不考慮這小段拉丁文的意思，只從常理推斷，時間上儒蓮要在 1825 年 10 月初完成「德國抄本」也是不太可能的。下文會確認儒蓮最遲在 3 月初開始抄寫，他經過「600 小時」的努力後，終於在 1825 年 8 月 25 日抄完《漢語劄記》，前後花了大約六個月的時間。即使他能再接再厲，在 10 月 7 日完成目錄和「排列、分配與抄寫」索引，相信他也沒有時間或精力同時在一個多月裡又抄寫了第二份的文本。

「德國抄本」兩頁的目錄精簡清楚，除了列出了緒論、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各章、篇，段和號外，更附有抄本的頁數和段落編號，使查閱更加直接省事。這目錄是「儒蓮抄本 A」，其他幾份為人所知的歐洲抄本甚至馬六甲刊本都沒有的，確是一項值得誇讚的創舉。

「德國抄本」和「儒蓮抄本 A」的索引的內容大致相同，但並非完全一樣。兩份索引根據同一套卡片編制，但「排列、分配與抄寫」後有些差異或錯漏是正常的，因為「德國抄本」的索引抄自儒蓮編制的索引，但「儒蓮抄本 A」的索引卻是由博斯偉編制的。前者首頁有一個冗長的名稱，說明索引是從馬若瑟書裡關於「人物、地方、困難發音」（Personarum, locorum, vocum difficiliorum [...]）等內容而編制的，但後者則只有索引（index）一字，沒有任何名稱。德國抄本 C 字母的條目共有 104 條，但「儒蓮抄本 A」則有 107 條；前者 V 字母的條目有 54 條，而後者則只有 52 條。字母排序也有點分別。「德國抄本」把在 J 字母的條目放在 I 字母的條目後面和 Y 字母的條目前面，接著才是 K 字母的條目，即字母順序為 I - J - Y - K。但「儒蓮抄本 A」這些條目的字母順序卻是 I - Y - J - K。這裡牽涉的是拉丁文和英文或法文字母混合排列的問題。把 Y 放在 K 前的根據是古典

拉丁文字母的排序，因為 Y 的拉丁文名稱是 “ix”，這點兩份抄本是一致的。J 的排序就比較尷尬，因為拉丁文沒有 J，它的排序不存在；但馬若瑟的漢語拼音方案裡卻有 J。不過，「儒蓮抄本 A」亦即博斯偉的排序顯然比較合邏輯，畢竟英文和法文均有 J，都是在 I 後面和 K 前面，所以 Y，拉丁文的 “ix” 或法文的 “i grec”，確是應該在 I 後面和 J 前面，然後才到 K。最後，「德國抄本」的索引條目大多只有拉丁文或拼音而沒有中文，但「儒蓮抄本 A」的條目則大多有相關的中文。對於閱讀《漢語劄記》這本充滿中文實例的書來說，在查閱時後者明顯比較優越。不過，雖然兩份索引有上述的個別差異，它們卻毫無疑問地都是根據雷慕沙的卡片而複製的，所以李真關於「儒蓮在抄寫過程……加上了自己編寫的……索引」這個結論同樣不能成立。<sup>34</sup>

既然「德國抄本」以至夾在封底的目錄和索引均非由儒蓮複製，那抄寫者會是誰呢？根據相關史料，本文的「合理推測」(educated guess) 是他就是德國東方學家諾依曼 (Karl Friedrich Neumann, 1793-1870)。這裡有一些史料可以作為此推測的「環境證供」。諾依曼早年學習亞美尼亞語，於 1828 年前往巴黎跟隨雷慕沙學習中文，翌年才啓程去中國。柯恆儒在 1830 年刊行的《關於巴黎亞洲研究進展之信》(*Briefe über den Fortgang der Asiatischen Studien in Paris*) 裡有如下一段：

上雷慕沙的課堂的還有博學而來自慕尼黑的諾依曼教授，他多才多藝和頭腦清晰，掌握了亞美利亞文和其他亞洲語言的全面知識，並打算將其用於（撰寫）論述關於該區民族的一份可取的著作。<sup>35</sup>

34 李真，〈德國巴伐利亞公立圖書圖書館藏《漢語劄記》抄本述略〉，頁 184。

35 Heinrich Julius Klaproth, *Briefe über den Fortgang der Asiatischen Studien in Paris*, 2nd ed. (Ulm, Germany: W. Neubronner, 1830), 12. 注意此書以德文尖角體 (Fraktur) 刊行，不習慣看此種字體者很難辨認閱讀。“Auch besucht Remusat's Vorlesungen der gelehrte Professor Neumann aus München, der bei grosser Vielseitigkeit und klarem Sinne, sehr gründliche Kenntnisse im Armenischen und andern Sprachen Asiens besitzt [sic, besitzt?], die er zu einer wünschenswerthen Arbeit über die Verfassungen der Völker dieses Erdtheils anzuwenden gedenkt.”

諾依曼在 1831 年刊行的書裡亦承認雷慕沙教過他漢語，說「感激此博學紳士之嚴格語法訓戒」。<sup>36</sup> 龍伯格沒有片言隻字探討「德國抄本」的來龍去脈，但說當諾依曼在巴黎學習中文時，他「應有使用一份《漢語劄記》抄本」。<sup>37</sup> 雷慕沙推崇馬若瑟，鼓勵學生抄寫《漢語劄記》，很難相信打算利用「亞洲語言」撰寫著作的諾依曼會不趁在巴黎時借教授的抄本複製，以便持續學習。「德國抄本」的文本證據支持此假設：和文獻裡所說的雷慕沙抄本一樣，此抄本的中文同樣是從右向左，文本裡同樣有比頁碼更詳細而和「儒蓮抄本 A」一致的段落編號，同樣在《玉嬌梨》之後加上 \* 標，並把法圖藏本刪掉的文字放進腳註（第 16 頁）。

諾依曼於 1829 年離歐往華進修中文和收購書籍，曾於廣州和澳門居住。當時清廷只許外商於貿易期間在廣州逗留，更不准女眷隨行。諾依曼在《亞洲研究》(*Asiatische Studien*) 裡透露有外商曾於 1830 年無諮詢中方而攜眷往粵，廣州官員聰明地避開與有防禦能力的外商正面衝突，卻等他們 1831 年初返澳後才採取象徵式懲罰，「拆掉新建於河畔花園之花棚」。<sup>38</sup> 諾依曼透過馬禮遜多年好友士丹頓 (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 爵士的介紹，和馬氏見過好幾次面，向他請教漢語並求他協助購書。馬氏曾在 1830 年 11 月 8 日致函士丹頓，告知他已與諾依曼會了面，會「盡量幫他」，更說他是「我家受歡迎之訪客」，經常在他回澳門時去他家裡。<sup>39</sup>

可以想像諾依曼會把他的《漢語劄記》抄本隨身攜帶以便持續學習，並在廣州時順便請當地的書商安排替抄本訂裝。這就可以說明為何「德國

36 Charles Fried Neumann,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and Armenian, With Notes and Illustrations* (London: The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1831), xi. 不過幾年後，諾依曼卻出版另一本書批評雷慕沙和指控他抄襲馬若瑟等。見 Charles Fried Neumann, *P. Premare, Marshman und Abel Remusat* (Munich, 1834).

37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80.

38 Karl [Charles Fried] Neumann, *Asiatische Studien*, 1st printing (Leipzig: Verlag von Johann Ambrosius Barth, 1837), 232-33, 237-38.

39 Eliz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and Longmans, 1839), 2:437.

抄本」首頁會寫上 1830 年，及它為何有藍布包紙版的中式裝潢而不是其他歐洲抄本常用的洋式牛皮或羊皮書面。夾在書內的目錄和索引沒有與文本一起訂裝，可能是諾依曼為了在閱讀抄本時隨時查閱，也有可能是他在回歐後才抄寫的。諾依曼重回德國後把大量於廣州購獲的中國書籍送給慕尼黑皇家圖書館，更被委任負責該館的中文書籍。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此份稿本和它的目錄及索引最終會入藏於與諾依曼關係密切的慕尼黑皇家圖書館亦即今天的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

總而言之，上述史料支持以下推論：「德國抄本」係諾依曼所抄，他很可能是在 1828 年於巴黎學習漢語時複製此份稿本，於 1830 年來華暫住時在廣州把它訂裝然後再帶回歐洲，最後大概是在晚年時把它和他自編的目錄及抄寫的索引一起捐給了慕尼黑皇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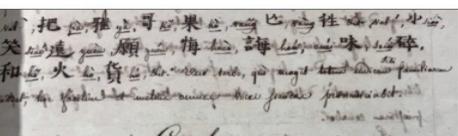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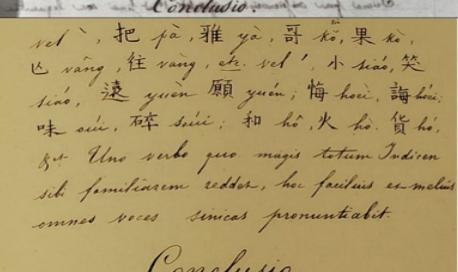
#### （四）三份抄本筆跡比較

不過，來自可靠史料的環境證供終歸還是不夠，本節會比較「儒蓮抄本 A」、「儒蓮抄本 B」和「德國抄本」這三份歐洲抄本的筆跡，為上述推論提供一些更直接的論據。這些比較會顯示無論是拉丁文或中文，德國抄本的筆跡顯然有異於兩份儒蓮抄本，而且與諾依曼一些其他稿本的筆跡很接近。為方便以下三份抄本的比較，我們會把「德國抄本」稱為「諾依曼抄本」。

手跡比較是一種藝術而不是一種科學，要考慮抄寫者本人在不同階段的書寫風格、抄寫習慣和語文能力，還要瞭解他的抄寫環境、抄寫目的、時間多寡和閱讀對象等。舉例：「儒蓮抄本 A」在 1825 年完成，是根據雷慕沙抄本而複製的。當時儒蓮是一個受雇的抄手，時間有限，而且必須用比較工整的字體書寫，因為稿本最終會用來排版。但「儒蓮抄本 B」則很可能是在 1830 年代他繼承雷慕沙的教席或被委任為皇家圖書館中文圖書負責人後直接抄自原稿的。其時他中文造詣肯定更加進步，時間也比較充裕，抄本主要是供自己參考，抄寫時的筆跡和風格當然會有些不同，這是可以理解的。本文作者並非筆跡專家，對三份稿本在抄寫時的各種複雜因素也不能完全掌握，只能根據現有文本提供一些初步證據，作為本段史料分析以外的佐證，以供讀者參考和做出判斷。以下五個表，表二至表

六，會利用從三份《漢語劄記》歐洲抄本以及其他兩份諾依曼手稿取得的截圖分析各文本的手跡。

表二 歐洲抄本文本比較

儒蓮抄本 A	
儒蓮抄本 B	
諾依曼抄本	

資料來源：CWML MSS 300, SOAS Archives, 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 London; O/C ADD. 11708, British Library, London; Cod. Sin. 1, [Guangzhou] 1830,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  
表三至表四同。

表二展示分別取自「儒蓮抄本 A」、「儒蓮抄本 B」和「諾依曼抄本」緒論第三章尾部的一段文字，它同時有拉丁文和中文字體。三段文字顯示雖然各抄本的拉丁文手跡均非完全相同，但「儒蓮抄本 A」和「儒蓮抄本 B」的風格顯然比較接近。「儒蓮抄本 A」的拉丁文字編排比較密集，字體比較垂直；「儒蓮抄本 B」的編排比較寬鬆，字體比較前傾；諾依曼抄本的編排則最密集，行與行之間距離最小，字體也有前傾的現象。但基本上前兩者的拉丁文字跡雖有差異，仍相當近似，而後者卻顯然不同。這裡只舉兩個例子。此段最後關於漢語發音的半句話 “[...] hoc facilius et melius omnes voces sinicas pronuntiabit” 的八個字裡有五個字以“s”結尾，而諾依曼抄本裡這五個字結尾的“s”一律向下方朝左勾的寫法，顯然有異於兩份儒蓮抄本同樣五個字的寫法。這句話下面的標題 “Conclusio” 亦顯示兩份

儒蓮抄本的筆跡很接近，尤其是開頭大寫草書的“C”和第七個字母“s”。同樣地，三段文字的中文總的來說亦顯示「儒蓮抄本A」和「儒蓮抄本B」的字跡比較相似。雖然有些個別的字「儒蓮抄本A」和「諾依曼抄本」的寫法較接近（例如：「往」字），或者「儒蓮抄本B」和「諾依曼抄本」的寫法較接近（例如：「小」字），但在多數的情況下，兩份儒蓮抄本的字體顯然比較相似，而「諾依曼抄本」的卻不太相同（例如：「雅、哥、果、笑、遠、願、誨、味、碎、和」字）。

表三 歐洲抄本拉丁文筆跡比較

儒蓮抄本 A	儒蓮抄本 B	諾依曼抄本
ad intra redit	ad intra redit.	ad intra redit.
aliquis	aliquis	aliquij
atque haec tria	atque haec tria	atque haec tria
dividuntur	dividuntur	dividuntur
dum stupidus	dum stupidus	dum stupdy
et significat	et significat	et significat
lingua sinica	lingua Sinica	lingua sinica
missionarius	missionarie	missionarii
sed ad latus	seu ad latuſ	seu ad laty

表三從緒論第二章第二篇第一段介紹漢語四聲的文本裡選出若干拉丁文短句或單詞作為比較。這裡分別列出表格裡每一個短句或單詞及其特別需要比較的字母如下：“ad intra redit”的兩個“t”，“aliquis”最後的“s”，“atque haec tria”第一個字的“q”和第三個字的“t”，“dividuntur”開始的“d”，“dum stupidus”結尾的“s”，“et significat”第二個字的“s”及“t”，“lingua sinica”第一個字的“g”和第二個字的“s”，“missionnarii”的“m”和“ss”，和“sed ad latus”前後的兩個“s”。總而言之，雖然「儒蓮抄本A」的拉丁字體比較垂直，而「儒蓮抄本B」和「諾依曼抄本」的字體比較前傾，三個抄本的拉丁文單字或短句顯示「儒蓮抄本A」和「儒蓮抄本B」的筆跡大體上很接近，但和「諾依曼抄本」的卻明顯不同。

表四從三分稿本各處選出若干中文短句或單詞作為比較。注意「儒蓮抄本 B」欠第一部，所以文本無法全面對比。還有，有一些字在同一份抄本不同頁面裡偶然會出現不同的寫法。在這種情況下，為求客觀，這裡採用的字樣截圖盡量是該抄本裡最常見的寫法。舉例：「儒蓮抄本 A」的「說」字多是如左邊截圖裡的寫法，但也有例外；而「儒蓮抄本 B」和「諾依曼抄本」此字則多是如中間和右邊截圖裡的寫法，不過偶然也會不同。但是，更多的字在同一個抄本不同頁面裡的寫法卻相當一致，包括「經、腦、笑、那、清」字。由此表可見，雖然儒蓮抄本之一和「諾依曼抄本」有些個別中文字的寫法比較接近（例如：「說」），在多數情況下，兩份儒蓮抄本的字跡基本上相當近似，亦顯然與「諾依曼抄本」的不太接近。

表四 歐洲抄本中文筆跡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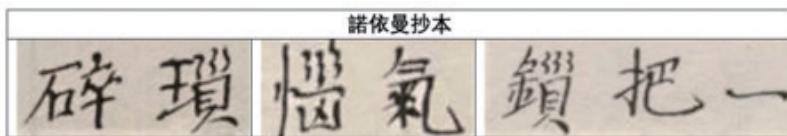
字	儒蓮抄本 A	儒蓮抄本 B	諾依曼抄本
經	經海山	King 經	經於見
腦	後背腦	腦 cerebrum.	腦頭沒
笑	笑是只	笑 <i>siao</i>	笑大哈哈
那	那	那 <i>nota</i>	裡那
清	清	in 清 <i>tīng</i>	清 <i>clarum</i>
說	得不說	ren 說文	說有沒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諾依曼抄本裡「經」字和「腦」字右上角「𠂇」部的獨特寫法。根據《玉堂字彙》，「𠂇即川字，古作坤字」，亦是「州、巢、巡」等字之部首。<sup>40</sup> 諾依曼這種寫法與兩份儒蓮抄本的寫法明顯不同，亦伸延至其他有「𠂇」部的複合字如「瑣」、「惱」和「鎖」字，儼然形

40 明·梅誕生，《玉堂字彙》元集（英德堂，康熙丙辰重刊），頁 71。

成他書寫這些中文字的「簽署」寫法。<sup>41</sup> 表五把「諾依曼抄本」裡含這三個字的短句輯錄，供讀者參考。

表五 諾依曼抄本其他中文字體



資料來源：Cod. Sin. 1, [Guangzhou] 1830,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

確認「德國抄本」手跡與兩份儒蓮抄本的不同及提供史料支持它可能是諾依曼複製不等於證明它就是諾依曼的抄本。要可靠地證實此點需要拿「德國抄本」和其他的諾依曼稿本比較。幸好慕尼黑皇家圖書館仍藏有他的手稿，其中幾份甚至有中文筆跡，包括他先後在 1829 年和 1858 年編輯的《刊本目錄》（*Verzeichnis der chinesischen, mandschurischen und mongolischen Drucke*）。<sup>42</sup> 這兩本目錄主要以德文書寫，而且除部分標題或書名寫的較工整外，字體相當潦草難認，但仍可以找到一些可比的樣本。表六匯集了「諾依曼抄本」和這兩本目錄裡的一些單字和短句。「諾依曼抄本」索引和諾依曼目錄的日期手跡相當接近。諾依曼抄本書名標題和目錄稿本的諾依曼簽名的字母 “N” 和兩者的易經拼音 “y King” 筆跡也如是。目錄裡的「經」字雖然寫的較緩慢工整，同樣地有「𠂇」部的獨特寫法。

41 注意瑣和鎖的異體字右上角的部分也是由「𠂇」組成的。

42 Karl [Charles Fried] Neumann, *Verzeichnis der chinesischen, mandschurischen und mongolischen Drucke* (Munich, 1858), BSB Cbm Cat. 45 c,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 Karl [Charles Fried] Neumann, *München, Hofbibliothek (1803-1829): Verzeichnis der chinesischen Drucke, 1829e* (Munich, 1829), BSB Cbm Cat. 45,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

表六 諾依曼稿本筆跡比較

	諾依曼抄本	諾依曼目錄稿本
日期	Perfugt die 8 <sup>te</sup> 1839	Münster 14 Febr 1858.
N 字 大 寫	<i>Notitia</i>	<i>Neumann</i>
易 經 拼 音	<i>y'king</i>	<i>Yking</i>
經 字 寫 法	目經	上祭

資料來源：Cod. Sin. 1, [Guangzhou] 1830,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  
 BSB Cbm Cat. 45 and 45 c,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

上述幾個表格顯示在三份歐洲抄本裡，「儒蓮抄本 A」和「儒蓮抄本 B」的手跡的確相當接近，而「諾依曼抄本」的卻明顯不同。同樣重要的是，「諾依曼抄本」跟其他諾依曼稿本的筆跡亦比較相似。這些和本節前段分析抄本史料和文本內容的結論不謀而合，為三份法國抄本的抄寫者身份提供有力佐證，修訂了現有論述在這方面的結論。

### 三、亞洲刊本

#### (一) 馬六甲英華書院首刊本

「儒蓮抄本 A」、「儒蓮抄本 B」和「諾依曼抄本」這三本歐洲抄本是《漢語劄記》第一波流傳的實例，但其中一份抄本——「儒蓮抄本 A」——也是該書接下來的幾波流傳的重要橋梁，因為它完稿不久後就成為《漢語劄記》在亞洲首次印刷之稿本，使此書終於可以付梓出版。這是《漢語劄記》首次脫離重抄本形態以刊行本形式的流傳，是它歷史上第二波及最重要的一波流傳，其背景值得比較深入探討。

當代人物的文獻提供了《漢語劄記》終於可以出版的來龍去脈，本文

會按日期先後討論這些資料。雷氏在 1822 年刊行的《漢文啓蒙》(*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 裡多次提及馬若瑟的作品，惋惜該書一個世紀以來「不公平地被遺忘」(enveloppé dans un injuste oubli)。<sup>43</sup> 不過，即使雷慕沙希望完成馬若瑟的遺志，為他出版《漢語劄記》，他也明白在歐洲鑄造大量漢字和排印該書的成本將會過於高昂，完全不切實際。

愛爾蘭貴族金斯伯勒子爵 (Lord Kingsborough, 1795-1837) 看過和認同雷氏書裡的意見，繼而主動與當時在倫敦的馬禮遜博士接觸，希望促成這樁美事。<sup>44</sup> 馬氏是首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他在 1807 年 9 月抵達澳門後長期在澳門和廣州兩地工作和學習漢語。經過多年努力，馬禮遜在 1815 年至 1823 年間相繼刊行了六卷本的《漢語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sup>45</sup> 又在 1810 年至 1823 年間完成出版多卷本的《神天聖書》，是為最早的兩套中譯新舊約聖經全書之一。在 1818 年，馬氏更於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培養華洋宣教人才和刊行中文聖經及其他刊物。他完成上述兩套大型著作後，在 1824 年首次也是終生唯一一次回英述職和休息，其時已被公認為一位傑出的漢學家。

當馬禮遜在英國休假期間，金斯伯勒與他聯繫，於 1824 年 9 月 4 日禮拜六在倫敦和他共進晚餐，於 9 月 6 日參觀他的中文藏書，並慷慨地捐贈一千五百英鎊和三百多本書籍給英華書院。馬氏在當天致倫敦會柯羅尼牧師 (Rev. Dr. Clunie) 的信裡透露，這筆在當年來說相當可觀的捐款只有一個附帶條件，就是「要求 (書院) 利用 (款項的) 第一筆利息印刷一本由一位耶穌會士撰寫的中文語法書；然後，(其餘的) 應計利息可以

43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hoa, c'est-à-dire, de la langue commune généralement usitée dans l'empire Chinois*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xvij.

44 他原名是 Edward King，父親是伯爵，本人是子爵，但英語習慣把有爵位的貴族統稱勳爵 (Lord)。金斯伯勒對學術興趣濃厚，是成本亦非常高昂的《墨西哥古物》(*Antiquities of Mexico*) 之作者。

45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London and Macao: Kingsbury Parbury and Allen; and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5-1823).

用於書院的一般用途」。<sup>46</sup> 對馬氏來說，這是個無法拒絕的要求。畢竟，開始運作不久的英華書院亟需經費和圖書，而書院已建立起相當規模的印刷設施，出版過不少中英文書籍，包括全套中文聖經《神天聖書》，一份叫《印中搜聞》（*The Indo-Chinese Gleaner*, 1817-1822）的英文期刊以及一些雙語書籍等，有能力刊行這本以拉丁文和中文撰寫的書籍。

在 1824 年 9 月 14 日，亦即和馬禮遜會面大約一個禮拜後，金斯伯勒致函在巴黎的雷慕沙，提及後者在他的書裡對《漢語劄記》的好評，提醒他曾為「如此有價值的作品，很可能對文學大有裨益，卻因為它包含太多漢字……將永遠無法在歐洲刊行」而感到惋惜，並承認雷氏的這個想法是「促使我與（馬禮遜）博士安排出版該書」的主要原因。<sup>47</sup> 要刊行此書，就必須有排版或刻板可用的稿本，這就是金斯伯勒要求雷慕沙找人複製抄本的原因。

重抄需時，翌年春天才有新信息。在 1825 年 3 月 4 日，金氏知道工作已安排妥當後，再度去信雷慕沙，對他加進由他編製的索引之建議表示讚賞，並說他這項貢獻「會在書裡獲得答謝」。<sup>48</sup> 在 3 月 8 日，金斯伯勒致函馬禮遜，告知他自己花了六十基尼金幣（Guinea）聘請雷慕沙的漢語學生重抄《漢語劄記》稿本，估計需時幾個月，希望「這本拷貝在到達目的地之前不會出意外」。他還補充說，雷慕沙為此稿本製定了「全書索引」，他認為「這會是對該書非常有用的一項補充」，已向雷氏「承諾會在該書頁面中適當地答謝」他的貢獻。最後，金斯伯勒宣稱：「通過出版這位學識淵博的耶穌會士——無疑是入華羅馬天主教傳教士裡最精通漢語奧秘者——的著作」，英華書院會對學術作出重大貢獻，不枉它的卓

46 Morrison to Clunie, 6 September 1824, in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2:287-88.

47 Kingsborough to Abel-Rémusat, 14 September 1824, in Abel-Rémusat,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539. 雷氏引用金氏信件的原文時並沒有直接寫出馬禮遜的名字，但從其他來往信件裡我們可以肯定金氏接觸的人就是馬禮遜博士。

48 Kingsborough to Abel-Rémusat, 4 March 1824, in Abel-Rémusat,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539.

越信譽。<sup>49</sup>

從本文上一節我們已經知悉接下來幾件事的時序：儒蓮在 1825 年 8 月 25 日完成抄寫工作，馬禮遜在 1826 年 2 月 15 日透過金斯伯勒收到「儒蓮抄本 A」，而博斯偉於 3 月 20 日完成按雷慕沙的條目卡片而編寫的索引。馬氏一家在 5 月 1 日登船離開英國前往亞洲，船隻在 8 月途經星加坡，在 9 月 19 日抵達澳門。由於星洲毗鄰馬六甲，相信馬氏應該是在 8 月時將「儒蓮抄本 A」傳遞給附近的英華書院。在 1826 年 9 月 26 日，亦即稿本安全抵達馬六甲後，金斯伯勒致函通知雷慕沙，說如果馬若瑟的大作終於能夠出版，雷氏肯定要記首功，因為「它的刊行是你大力推薦的」。<sup>50</sup>

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當時的關係不見得特別友好，馬禮遜剛入華時士丹頓曾警告他「澳門之羅馬教士視其為敵，相當嚴格，甚至會比歐洲天主教國家裡更甚」，<sup>51</sup> 在這項目中只能被形容為一個被動的合作夥伴。龍伯格敘述此事時表達含糊，說「馬禮遜與金斯伯勒建立聯絡」，兩人同意後者「出資刊行《漢語劄記》」，嚴格上不算說錯。<sup>52</sup> 但李真將此說進一步闡述為「馬禮遜有心出版馬約瑟的這部語法著作，於是和金斯博魯商議，由金斯博魯出資 1500 磅資助馬六甲英華書院印刷出版拉丁文版」，則明顯誤解了馬氏的角色和捐款的用途。

一千五百英鎊當年是個大數目，下文會證實它遠遠超過印書的費用，對英華書院肯定是雪中送炭。馬氏在 1824 年 9 月 6 日的信裡確認款項主

49 Kingsborough to Morrison, 8 March 1825, in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2:317-18.

50 Kingsborough to Abel-Rémusat, 26 September 1826, in Abel-Rémusat,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539.

51 Morrison to J. Hardcastle, 4 November 1807, in Eliz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and Longmans, 1839), 1:162. “The Romish clergy at Macao, Sir George [Staunton] informs me, have it amongst them that I am come out to oppose them: and that there they as rigid, if not more so, than in Romish countries in Europe.”

52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78. “Contacts were established between him and Lord Kingsborough. [...] It was agreed between Morrison and Kingsborough that the latter should pay for the printing of the *Notitia* [...].”

要歸書院使用，出版計劃只是金氏單方面提出的捐款附帶條件。然後，在 9 月 14 日，金氏才把出版設想告知雷慕沙，請他安排複製稿本。雷慕沙認識馬禮遜，曾說「馬禮遜博士之中英字典遠勝於其他所有者」，而馬氏亦曾在 1824 年 6 月往巴黎時與雷氏（和柯恆儒等）會面，<sup>53</sup> 但兩人在此事上並無直接交往。所以，李真所說的「馬禮遜委託雷慕沙的學生儒蓮謄寫雷慕沙的抄本」亦絕無其事，<sup>54</sup> 馬禮遜當時根本不知抄寫者是誰，因為金氏在信裡只說是雷氏的一位學生。

英華書院當年一系列的年報有助我們瞭解《漢語劄記》排版和印刷的情況。1827 年的年度報告是如此說的：

一位貴族把一份長達 400 頁對開本、內容豐富而以中文和拉丁文撰寫的語法書稿本饋贈書院，他亦向書院慷慨致送 1500 英鎊的巨額捐款和大量裝訂精美的珍貴書籍。語法書會在情況許可下儘快付印，但由於印刷數量有限，希望有意購買者趁早預定。<sup>55</sup>

接下來幾年的書院年報經常會提及該書的印刷或費用。1828 年的報告指出該書「其中幾頁已經開始印製」，顯示試版工作的開展。<sup>56</sup> 但 1829 年的年報卻承認「由於需要雕刻大量漢字以及其他情況，這項工作的完成時間遠遠超出校監（馬禮遜）所預計的期限」。<sup>57</sup> 最後，時任校長的修德（Samuel Kidd, 1804-1843）牧師在 1831 年 3 月 7 日致倫敦會的信函裡確認

53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2:181, 282-83. 頁 181  
原文：“Le Dictionnaire Chinois-Anglais du Docteur Morrison seroit incomparablement preferable à tout autre.”

54 李真，《馬若瑟《漢語劄記》研究》，頁 66。注意李真，〈德國巴伐利亞公立圖書圖書館藏《漢語劄記》抄本述略〉，頁 183 亦有類似說法。

55 *The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Mission Press, 1827), 10.

56 *The 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Mission Press, 1828), 10-11.

57 *Report of the Eleventh Year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Mission Press, 1829), 7. 英華書院年報的命名不太一致，1828 年的年報是「第六份」年報，但 1829 年的年報忽然變成「第十一年」的年報，因為後者是從 1818 年創校年度算起。

在經過頗艱巨而費時的校對與排印工作後，「拉丁文中文語法書已於一月份完成……我藉此機會向你們寄發九十四本拷貝，請你們交給一些書商代銷」。<sup>58</sup>此一手資料確認此書在一月已然印好，三月初亦安排好船期寄往英國，而不是現有研究所說的「直到 1831 年 6 月才全部完成」。<sup>59</sup>

在長達四年餘的辨讀文稿，改錯補漏，抄稿造字及刻板排印過程中，「儒蓮抄本 A」肯定曾經多名書院師生和印刷技工的重複來回翻閱，可以說是幾本歐洲抄本裡最多人使用過的一份。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稿本多處污跡墨痕和鉛筆手跡看出一些端倪。與此同時，相信修德和其他有機會閱讀《漢語劄記》稿本的外籍師生也很可能從中獲益良多，漢語學養得到提升。

與書院關係密切的基督新教漢學家均摒棄傳統的宗派偏見，不約而同地讚賞該書。返英後於 1837 年成為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也是英國首任中文教授的修德曾為「像劄記如此出色的著作卻遲遲未能刊行而感到嘖嘖稱奇」。由 1840 年底開始掌校而於 1876 年成為牛津大學首任中文教授的理雅各博士則說「沒有羅馬天主教傳教士留下了比他（馬若瑟）對漢語更深入了解的豐碑」，明言要給《漢語劄記》「過高的評價幾乎是不可能的」。<sup>60</sup>

雷慕沙在收到《漢語劄記》首刊本後曾在法文雜誌發表書評，對此最終產品有些微言，認為「馬六甲的版本只是增加（拷貝的）數量；因為它只是一個忠於細節，精準和正確的複制品，沒有任何變化，沒有任何註

58 Kidd to LMS, 7 March 1831, Singapore, 4, CWM/LMS/Ultra Ganges. Malacca, incoming correspondence, box 3, folder 2, SOAS Archives, London. “The Latin Chinese Grammar was finished in January last [...] I send you by this opportunity 94 copies to be placed at the disposal of some book-seller [...].”

59 李真，《馬若瑟《漢語劄記》研究》，頁 67。

60 柯保羅等編，《皕載英華》（香港：三聯書店，2018），頁 183、226，第三章附註 74 和 75 顯示兩段引用原文來自 Samuel Kidd, *China, or, Illustrations of the Symbols, Philosophy, Antiquities, Customs, Superstitions, Laws,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London: Taylor and Walton, 1841), 384; James Legge, *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 (Hong Kong: Hongkong Register, 1852), 64.

釋，沒有任何改動，也沒有任何增加」。<sup>61</sup> 雷慕沙這個說法不完全正確，因為「儒蓮抄本 A」並非十全十美，文本裡有不少錯漏，需要修正編輯後方能排版付印。這裡只舉兩個例子：稿本第 323 頁《醉翁亭記》裡的一句話漏了「在酒」兩字，變成「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間也」，恰好賦予該句子相反的含義。幸好英華書院裡不乏熟悉古文的師生，在該頁以鉛筆作出修改，而 1831 年刊本第 220 頁裡這句話亦改正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稿本第 385 頁選自陳驥《古學鉤玄》的四字成語裡有「緣衣使者」和「飲醴茹芝」兩條，該頁右邊界兩句旁有書院編輯者以鉛筆寫上「緣」字和「茹」字，1831 年刊本第 261 頁裡這兩句成語亦修正為「緣衣使者」和「飲醴茹芝」。<sup>62</sup>

不知是否因為馬禮遜事忙忘記或是書院同仁與他沒有溝通清楚，雷慕沙正確地指出該首刊本「欠缺任何編輯者應附上之序言和解釋性的緒論」。它不只沒有介紹馬若瑟和《漢語劄記》的任何背景資料，甚至沒有提及儒蓮重抄稿本的因由和金氏的參與，也沒有答謝雷氏在索引方面的貢獻，這些都是美中不足的。在書評裡，雷氏再次感謝金斯伯勒「構想出此慷慨設計」，推動該書出版。<sup>63</sup>

上述其中一個缺陷在刊本寄出後果然給書院帶來了一點麻煩。修德在 1831 年 3 月 28 日寫信給倫敦傳道會，告知他剛收到馬禮遜來函，說如果刊本裡「沒有以任何方式提及金氏」，後者可能會不悅，要求在書裡附加致金斯伯勒的獻詞，請倫敦方面暫緩發售該書。<sup>64</sup> 可惜這封信在 10 月

61 Abel-Rémusat,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538-39. “[...] [L]’édition de Malacca ne fait qu’en accroître le nombre; car c’est une représentation, fidèle jusqu’à la minutie, du manuscrit primitive et des transcriptions où l’on a tout reproduit avec exactitude et correction, sans aucun changement, sans aucune note, sans la moindre altération, sans la plus légère addition.”

62 Prémar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Paris:1825), 323, 385; 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Malacca: Collegii Anglo-Sinici, 1831), 220, 261.

63 Abel-Rémusat,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538-39. “A défaut d’une préface des éditeurs et d’un frontispice explicatif, qui manquent absolument dans le volume imprimé [...] .” “Le lord Kingsborough [...] conçut [...] le généreux dessein [...] .”

64 Kidd to LMS, 28 March 1831, Malacca, 1-2, CWM/LMS/Ultra Ganges. Malacca,

14 日才寄達總部，20 日才由有關委員會討論，其時已有部分書籍售出，金氏亦已看過一本。相信子爵即使大人有大量，不計較刊本沒有提及自己的貢獻，也會覺得書裡沒有一字向提供詳細索引的雷慕沙致謝，實在是不應出現的疏忽。現存的英華書院刊本裡顯然有兩個版本的封面，其下端刊行者的名稱稍微不同，分別為“*Collegii Anglo-Sinici*”和顯然比較適合英華書院的中學定位之“*Academiæ Anglo-Sinenesis*”，而後者附有一頁以拉丁文撰寫的獻詞於文本前方。在此，刊本編輯者對使「此淵博、簡潔、有用之作品」(*opus hoc doctum, concinnum, utilissimum*) 得以面世的「慷慨贊助者」(*patronomunifico*) 表示謝意，但沒有指名道姓地提及金斯伯勒。這一頁顯示出英國人內斂性格的附加文件顯然就是倉促後加的獻詞。

雷慕沙根據馬六甲刊本把稿本開始的第一句「關於漢語之劄記」“*ad linguæ sinicæ notitiam*”打印在該書每頁的頂部的做法得出了「監督者似乎不太懂拉丁語」(Les personnes qui l'ont surveillée ne paroissent pas très versées dans l'intelligence du latin) 的結論。<sup>65</sup> 這個評論不太公平：以文本第一行的開頭單詞作為該文本的標題是一種古老習俗，猶太人就曾以舊約聖經《申命記》文本裡的首句 “*êlleh haddəbārîm* (these are the words)” 作為該卷書的名稱。在印刷《漢語劄記》時編輯者採用這種做法可以被視為過時或不妥，但不應被當作對拉丁語無知的證據。此外，只要略略看過「儒蓮抄本 A」裡有時頗為潦草難認的拉丁文字，大家很快就會明白如果沒有熟悉拉丁文的人才，書院團隊根本無法製版排印這個刊本。

從 1826 年到 1831 年，英華書院掌校的先後為宏富禮 (James Humphreys, 1794-1876)、高大衛 (David Collie, ?-1828) 和修德三位牧師，他們應該都熟悉拉丁文。三人在接受傳統英國教育之餘均曾被倫敦傳道會送往博格 (David Bogue, 1750-1825) 博士領導的戈斯波特 (Gosport) 神學院深造。知名神學教授博格認為拉丁文和希臘文分別為「博學世界之語言」及「古代世界最聰明的人之語言」，而在神學院裡西方古典作者如「維吉爾 (Virgil)、賀拉斯 (Horace)、凱撒 (Caesar)、塔西圖斯 (Tacitus)、

---

incoming correspondence, box 3, folder 2, SOAS Archives, London.

65 Abel-Rémusat,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540.

利維（Livy）和奧維德（Ovid）的作品」均被列為必修課本。<sup>66</sup> 修德亦曾在他的著作《中國圖解》裡比較中國人的「三魂」和羅馬人的“manes, anima/spiritus, umbra”這兩個概念，並引用奧維德的拉丁文詩詞以作佐證。<sup>67</sup>

書院裡還有幾位懂拉丁語的學生，包括澳門出生及於都柏林聖三一學院畢業後才入校學習漢語的荷蘭人摩爾（John Henry Moore），馬禮遜在英國念完寄宿學校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和來自四川及曾在檳城天主教學校進修拉丁文的袁德輝（在倫敦會檔案裡他通常只被稱為 Shaou Tih，亦即小德）。摩爾和袁德輝大約同期，曾和後者一起「學習我大學時期的一本舊拉丁文版《歐幾里的》（*Euclid*）」，還說「我們也經常一起閱讀《格老秀斯》（*Grotius*，早期荷蘭國際法專家的拉丁文作品）和拉丁文聖經」。<sup>68</sup> 袁同學很有天分，為了鼓勵他，學校曾雇用他把一本叫 *Stockii Clavis Linguæ Sinicæ (veteris Testamenti)* 的拉丁文原著譯成中文，以供書院教學之用。另一位同學美國人亨特（William Hunter, 1812-1891）在回憶錄裡說袁德輝的中文和拉丁文兼優，學習英語亦很認真，「非淺嘗乃深耕」，同學們都暗地裡稱呼他為「讀書人」，而他更「寫得一手好字」，有在出版部裡幫忙做抄寫工作。<sup>69</sup> 這幾位高班生經常參與學校的各種服務，雖然他們均在《漢語劄記》完成印刷前相繼畢業離校，相信袁德輝及其他同學很可能都有參與此書的稿本辨認、抄寫、製版、校對或排印等工作。

《漢語劄記》成本相當高。幾年前，書院曾以 125.50 西班牙元印刷一本由高大偉撰寫的《四書》英譯本，「定價五西班牙元（不附中文原文）或六元（附中文原文）」，這些數字有參考價值。<sup>70</sup> 由 1828 年 7 月到

66 Christopher A. Daily, *Robert Morrison and the Protestant Plan for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68.

67 Kidd, *China*, 172.

68 柯保羅等編，《皕載英華》，頁 178。

69 同上註，頁 176-177、214-215。袁德輝後來回華被清廷聘用為外語翻譯官，曾為林則徐「四位熟悉英語的華人」翻譯之一。

70 *The 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11, 17.

1829 年 12 月，1830 年 1 月至 1831 年 6 月和 1831 年 6 月至 1834 年 1 月的三份不定期但連續的支出報表分別列出 261.60、333.75 和 18.05 西班牙元的有關費用。根據上述數據和學校報告中其他信息，我們估計這本書的總支出約為 606 西班牙元，即接近五倍《四書》英譯本的成本。<sup>71</sup>

關於書本售價修德在 1831 年 3 月 7 日致倫敦會的信裡說「如果以付出的費用和時間為標準……我認為應該收十西班牙元亦即兩英鎊」，但他也說如果董事們認為此價格過高，則請他們訂定更合理之價錢。<sup>72</sup> 倫敦會檔案裡有一份關於《漢語劄記》的備忘錄，確認 1831 年 9 月 20 日該會以董事局決定的售價 1 英鎊 1 先令賣了第一本書給剛好從廣州回歐洲而路經倫敦而前文已經介紹過的諾依曼。<sup>73</sup> 雖然這個價格比修德建議的低，書院其實沒有吃虧。因為 606 西班牙元按修德的匯率等於 121 英鎊。金氏 1500 英鎊的捐款在 1824 年已交了給馬禮遜，即使假定該款項每年只有 2% 利息，到 1828 年也已累積了 120 英鎊的前期利息，足夠支付印刷該書的全部費用，而所有銷售收入和以後來自捐款之利息則全為書院的額外淨收入。

龍伯格聲稱「不知道（1831 年的《漢語劄記》）印刷了多少本子」，<sup>74</sup>

71 *The 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14; *A Report of the Malacca Mission-station and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from January 1830 to June 1831* (Malacca: Mission Press, 1831), 7, 30; *The Ninth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for the Years 1832 and 1833* (Malacca: Mission Press, 1834), 24. 註年報註明第一個年報裡的費用含年報印刷的費用，而第三個年報第 4 頁則聲稱 18.05 買紙的費用不止用於此書和分列當年年報印刷費用為 7.61 西班牙元。如果把數目不大的買紙費用全算進去，我們可以估計《漢語劄記》的總成本為： $261.60+333.75+18.05-7.61=605.79$ ，即大約 606 西班牙元。

72 Kidd to LMS, 7 March 1831, Singapore, 4-5. “[...] [I]f the expenses of printing & the time consumed on it be the criterion [...] I have accordingly thought of charging them Spanish Dollars (which is exactly £2 sterling) [...].”

73 Memorandum Respecting Prémare's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20 October 1831, CWM/LMS/Ultra Ganges.Malacca, incoming correspondence, box 3, folder 2, jacket B, SOAS Archives, London.

74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79.

其實文獻裡是有相關資料的。英華書院刊行的《漢語劄記》印刷數量不大——剔除寄給倫敦會的 94 本後，只有少量留在馬六甲由書院直接發售，估計總數只有百多本。這個數量的首刊本當然比冊數更少的歐洲抄本對該書的流傳有利，但畢竟仍是十分有限。

## (二) 廣州《中國叢報》英譯本

《漢語劄記》原始稿本在 1728 年完成，首刊本卻要到 1831 年才面世，出版過程足足需時一個世紀。不過，將首刊本譯成更多人可以使用的英文版卻只花了十五年的時間，更是發生在馬若瑟曾被流放的城市—廣州。這是該書第三波也是首次以翻譯刊本的流傳。

1842 年簽署的《南京條約》開放了上海、廣州、寧波、福州和廈門五個條約港口，准許外國人自由貿易和傳教，洋人來華者日眾。無論是宣教、經商或外交，他們均需學習漢語。成功自學中文而後來成為英國駐華外交官的羅伯聃（Robert Thom, 1807-1846）在 1840 年曾聲稱「我們必須介紹讀者參閱《漢語劄記》這本極有價值的作品，我們建議在不久的將來替它穿上英語新衣，以造福年輕的學子」。<sup>75</sup> 1838 年的《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刊登了一編介紹漢語學習的文章，作者說：

與其使用（馬禮遜的語法書），我們寧願向那些曾經在求學時學過古  
典語文（指拉丁文）的人推薦馬若瑟的《漢語劄記》，一本他們會覺  
得非常有用的作品，充滿對有關語言深刻理解的證據。<sup>76</sup>

這份推薦特別難能可貴，因為署名簡寫為“J. R. M”的作者是年紀輕輕已精通華語和嶄露頭角的馬儒翰，時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的中文秘書。作為馬禮遜的兒子，他能夠「幫理不幫親」地推薦天主教徒馬若瑟而不是

<sup>75</sup> Sloth [Robert Thom], *Esop's [sic] Fables, Written in Chinese by the Learned Mun Mooy Seen-Shang, and Compiled in their present form by His Pupil Sloth* 意拾喻言 (Canton: Canton Press Office, 1840), xvii.

<sup>76</sup> John Robert Morrison, “Review of the facilities existing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specially as regards England and Americ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7, no. 4 (1838): 114.

基督新教自己已故父親的語法書，可見前者肯定是卓越的。

羅伯聃關於出版英譯本的願望很快地就獲得他人響應。在美國首位來華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牧師的鼓勵下，他年輕的親戚裨雅各（James Granger Bridgman, 1820-1850）入華不久之後就接受了此項挑戰，把《漢語劄記》譯成英文，並在 1847 年透過裨治文於廣州創辦的《中國叢報》刊行。裨治文同年在《中國叢報》裡撰文介紹這本剛面世的英文譯本，重申馬若瑟的忠告，提醒讀者與其浪費時光「抄寫各種詞典」，倒不如熟讀《漢語劄記》。<sup>77</sup> 1847 年的英譯本是一本四開本共 326 頁的刊本，文本裡的漢字行文方向亦重新改為從左至右，與外文看齊，這是一個重要的改進。不少有識人士均認同英譯本順應時代需求，但此刊本卻鮮獲好評。相反地，論者常常指出它種種的不是。近代漢學家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對馬若瑟評價很高，但對英譯本並不熱衷。他是這樣說的：

不知為何此本譯本以最令人驚訝之方式扭曲了拉丁文原文的意思。它經常可以說出與馬若瑟原意完全相反的含義，並且幾乎始終如一地刪掉使馬若瑟的拉丁文（文本）如此可讀的有趣段落。<sup>78</sup>

龍伯格對它的看法也相似，說這本英語翻譯「不幸地包含如此多的錯誤和遺漏，幾乎已變得毫無用處」。<sup>79</sup>

當然，對大多數不諳拉丁語的現代讀者來說，這兩位博學的學者的觀點可能顯得有些苛刻，因為起碼英文版的確使更多外國人能透過此書學習漢語。儘管如此，上述的批判至少有點道理。例如，裨雅各聲稱「一些看來似乎沒有實際用途的句子已被省略，包括作者緒論的很大部分」。馬若瑟在緒論第三章裡有九個不同韻母的列表，每個列表裡再按韻尾和韻腹順

77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Th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 G. Bridgma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6, no. 5 (1847): 267.

78 Joseph Needham and Christoph Harbsmeier, *Language and Logic*, ed. Kenneth Robinson, vol. 7, part 1, *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6.

79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79.

序排列大量單字，說明傳統文學押韻的概念，在馬六甲刊本裡共有二十一頁表格和兩頁註釋。英文版的譯者認為這些列表對「現代學生沒啥意義或用途」，<sup>80</sup>把它們通通刪掉，另外提供了一系列以拼音從 A 到 Z 的字典排序單字列表，明顯有違作者的原意。按他的說法，可能論述文言文的第二部五章也可以刪掉，因為這應該同樣對現代人「沒啥意義或用途」。有人會認為忠實翻譯完整的作品並讓讀者決定其中某些部分是否有用可能會較可取。

英文譯本增加了一份目錄，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小心查看此簡短目錄後我們會發現一些問題。舉例，目錄表明「終結助詞」涵蓋第 92 至 135 頁，但在文本中，只有第一部第二章第二條第五段的標題為「終結助詞」(Final Particle/de Particulis Finalibus)，其他在這些頁數裡的二十個段落論述的包括前方、終結、連接或過渡助詞而不是專講終結助詞，顯示目錄確是過度簡化了，並不能準確反映出文本段落的內容。相反地，「諾依曼抄本」的目錄則把這二十個段落清楚地列出。

「儒蓮抄本 A」和 1831 年的刊本均附有詳細索引。雷慕沙所編製的索引不能說是包羅萬有（舉例：《漢語劄記》裡有拉丁文和中文對照及橫跨六頁的〈天主總論〉，文中多次提及天主，索引裡卻沒有任何與「天主」有關的條目），但在字體頗小的馬六甲刊本裡這份索引占據了二十八頁，有許多條目，方便查找語法（例如：Accentus/Accents）、單字（例如：水 / choui）、詞語（例如：首飾 / cheou-che）或經典（例如：山海經 / chan-hai-king）等的頁數。不過，年輕的裨雅各認為「原來顯然超乎必要或欠缺優勢的索引已被省略，取代它的是一個簡明扼要，並同樣有用者」。結果，1847 年英譯刊本的索引只有四頁，刪掉原來索引中絕大多數的條目，包括上面引用的所有示例。相信很少有人會同意譯者短得多的索引是「同樣有用」。<sup>81</sup>

80 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trans. James Granger Bridgman (Canton: Chinese Repository, 1847), xiii. “[...] being of little relevance or use to the modern student.”

81 Prémare, preface and table of contents to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Canton: Chinese

### (三) 香港拿撒勒出版社重刊本

這本漢語書的第四波亦即本文會談及的最後一波流傳與第三波相隔了約五十年。此次，《漢語劄記》在香港由一家天主教出版社以拉丁文原文重新發行。

法國巴黎外方傳道會（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多年來致力於亞洲事工，自十七世紀中葉以來，梵蒂岡當局就直接委任主教向「中國和鄰國傳教」，負責「在異教徒之地」(in partibus infidelium)宣揚福音。<sup>82</sup>傳道會屬下的拿撒勒出版社（Imprimerie de Nazareth）成立於 1884 年，總部設在香港，活躍於中國，日本和亞洲其他地區。它「可以用四十種亞洲語言印刷書籍」，是當年亞洲「從印度到日本最知名」的（天主教）出版社。<sup>83</sup>

在 1893 年，亦即馬若瑟為有志入華天主教士而撰寫《漢語劄記》的一百六十五年後，拿撒勒出版社重新刊行此書，以供在華天主教傳教士使用，終於完成了作者原來的出版設想。考狄花了不少筆墨介紹 1831 年的馬六甲初刊本，但顯然對 1893 年的拿撒勒重刊本興趣不大，只有僅僅一小句的描述：「不外是馬六甲（刊本）的文本」（Ne donne que le texte de Malacca）。<sup>84</sup>

重刊本其實有一個顯著的改進：和 1847 年的英譯本一樣，這個新的

---

Repository, 1847); Prémar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Canton: Chinese Repository, 1847), 92-135, 325-28; Prémare, index to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Malacca: Collegii Anglo-Sinici, 1831), 1-28; Prémar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Malacca: Collegii Anglo-Sinici, 1831), 88-120. Preface 原文：“The original Index, which seemed to be extended beyond the limits of necessity or advantage, has been omitted, and one more concise, and it is thought equally useful, placed in its stead.”

82 Adrian Launay,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Étrangères* (Paris: Téqui, 1894), 1:34, 45.

83 *Missions Etrangères et Langues Orientales. Contribution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à la connaissance de 60 langues d'Asie. Bibliographie de 1680 jusqu'à 1996* (Paris: L'Harmattan, 1997), 8.

84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column 1669. “Ne donne que le texte de Malacca.”

拉丁文版也把文本裡的中文從左至右排列，與拉丁文看齊。1893 年的拉丁文本與 1831 年的初刊本之間還有其他差異，都是一些比較小的更正。這裡只舉一個例子：上文筆跡比較的部分引用了緒論第三章一段文字，其中有一個拉丁文字是“pronunciabit”，在該句的語境裡是「講出／發聲」的意思。馬六甲刊本把抄本裡正確的字誤植為“pronunciabit”（第 37 頁），香港刊本則把它改正為“pronuntiabit”（第 33 頁）。

不過，最重要的是，當時重刊此書有實際需要。到了十九世紀末，市面上根本很難找到一本任何版本的《漢語劄記》，天主教出版社重印的拉丁文版本滿足了在華天主教傳教士的廣泛需求。

1893 年的拉丁文版顯然在數十年後仍有需求。拿撒勒出版社在 1933 年的刊物目錄中列出近九百種書籍，包括共 255 頁和於 1893 年發行的《漢語劄記》。該書被歸類於漢語書籍之一，價格為 2.50 元（平裝本）或 3.50 元（精裝本）。同屬此類的還有六本書，三本是漢語字典和三本是較小型的著作。<sup>85</sup> 換句話說，即使遲至 1930 年代初，《漢語劄記》仍然是亞洲首屈一指的天主教出版社所推崇的漢語語法權威著作。

#### 四、結論

馬若瑟在 1728 年完稿的《漢語劄記》對漢語學習的獨特方法既是它的優點也是它的缺點。修德認為該書教導「中華口語與文書」，在此所有「該語言的原則，結構和美感全透過來自最佳著作裡之大量實例加以說明」。<sup>86</sup> 但馬儒翰亦正確地指出：「它最大之缺陷，係欠缺從廣泛經驗中推論出之通用規則」。<sup>87</sup> 也許我們應該把最後的評語留給重新發掘馬若瑟的雷慕沙。他說作者「遠離拉丁文語法家之老路」（quittant la route battue

<sup>85</sup> *Imprimerie de Nazareth. Pokfulum, Hong Kong. Catalogue, Juin 1933* (Hong Kong: Nazareth Press, 1933), 29, 57.

<sup>86</sup> Samuel Kidd, “Critical Notices of Dr. Morrison’s Literary Labours,” in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2:86.

<sup>87</sup> Morrison, “Review of the facilities existing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14.

des grammairiens latins），另闢途徑，以眾多實例代替通用規則，從而使所有語法都變得多此一舉。誠如雷氏所言，上述「同時是對馬若瑟神父作品之稱譽及對它唯一有根有據之批判」（à la fois l'éloge du travail du P. Prémare et la seule critique fondée）。<sup>88</sup> 換句話說，套用一個現代現象，馬若瑟十八世紀初的語言習得觀與今天互聯網上可以學習二十多種語言，有超過三億登記用戶的「多鄰國」（Duolingo）的方法不約而同，可惜馬氏顯然是遠遠地走在他時代的前面。

本文討論《漢語劄記》三份歐洲抄本和三種亞洲刊本的歷史與現況，提出了與過去雷慕沙、考狄、龍伯格和李真等人的學術研究不同的一些推論和想法，亦填補了上述研究的一些遺漏及空白。三份歐洲抄本係《漢語劄記》在被遺忘接近一個世紀後第一波有限流傳的標本。現藏於亞非學院而學者罕有研究的「儒蓮抄本 A」之重要性尤其不容忽視。它除了本身有許多重要的歷史資料外，亦為探討另外兩份分別藏於大英圖書館和德國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的歐洲抄本提供可靠的比較基礎，更透過作為亞洲首刊本的稿本而成為餘下幾波流傳之橋梁。

具體地說，本文重點有四：

一、為現藏於倫敦亞非學院檔案館編號 CWML MSS 300 之「儒蓮抄本 A」建構完整出處流傳歷史和提供關鍵區別特徵，填補至今被學術論述廣泛忽略的空白。

二、為現藏於倫敦大英圖書館編號 O/C ADD. 11708 之「儒蓮抄本 B」重新確認抄寫者的身份，反駁先前一些學者的質疑。

三、為現藏於慕尼黑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編號 Cod. Sin. 1, [Guangzhou] 1830 之「諾依曼抄本」確定抄寫者的身份，推翻最近某期刊文章中的結論。

四、為馬六甲英華書院於 1831 年出版的首刊本闡明其出版歷史及編者貢獻，澄清某些研究者的誤解。

---

88 Abel-Rémusat,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2:270.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明·梅誕生，《玉堂字彙》，英德堂：康熙丙辰（1676）重刊。

(法) 馬若瑟，《經傳議論》，MS Chinois 7164.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A Catalogue of the Harleian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Vol. 3. London, 1808.

*A Report of the Malacca Mission-station and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from January 1830 to June 1831*. Malacca: Mission Press, 1831.

Abel-Rémusat, Jean-Pierre. *É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hoa, c'est-à-dire, de la langue commune généralement usitée dans l'empire Chinois*.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Abel-Rémusat, Jean-Pierre. *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 ou Recueil de morceaux de critique et de mémoires, relatifs aux religions, aux sciences, aux coutumes, à l'histoire et à la géographie des nations orientales*. Vol. 2. Paris: Schubart et Heideloff, 1829.

Abel-Rémusat, Jean-Pierr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auctore P. Premare.” *Journal Des Savants* (September 1831): 537-45.

Bridgman, Elijah Coleman. “Th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J. G. Bridgma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6, no. 5 (1847): 266-69.

Cordier, Henri.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Alexander Wylie.” In *Chinese Researches*, edited by Alexander Wylie, 7-18. Shanghai, 1897.

Cordier, Henri.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l'Empire chinois*. Vol. 3. Fasicule 1. Paris: Librarie Orientale and Américaine, 1906.

Fourmont, Étienne. *Linguæ Sinarum Mandarinicæ hieroglyphicæ grammatica duplex, Latinè, & cum characteribus Sinensium [...]*. Paris: Lutetiæ Parisiorum, 1742.

*Imprimerie de Nazareth. Pokfulum, Hong Kong. Catalogue, Juin 1933*. Hong Kong: Nazareth Press, 1933.

- Julien, Stanislas Aignan. *Meng Tseu vel Mencium, inter Sinenses philosophos, ingenio, doctrina, nominisque claritate Confucio proximum*. Paris, 1824.
- Kidd, Samuel. "Critical Notices of Dr. Morrison's Literary Labours." In Eliz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1-87.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and Longmans, 1839 (note this is at the end of said volume, with new pagination).
- Kidd, Samuel. *China, or, Illustrations of the Symbols, Philosophy, Antiquities, Customs, Superstitions, Laws,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London: Taylor and Walton, 1841.
- Kidd to LMS, 7 March 1831, Singapore. CWM/LMS/Ultra Ganges.Malacca, incoming correspondence, box 3, folder 2.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Archives, London.
- Kidd to LMS, 28 March 1831, Malacca. CWM/LMS/Ultra Ganges.Malacca, incoming correspondence, box 3, folder 2.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Archives, London.
- Klaproth, Heinrich Julius. *Briefe über den Fortgang der Asiatischen Studien in Paris*. 2nd ed. Ulm, Germny: W. Neubronner, 1830.
- Launay, Adrian.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Étrangères*. Vol. 1. Paris: Téqui, 1894.
- Legge, James. *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 Hong Kong: Hongkong Register, 1852.
-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Vol. 19. Paris: Nicolas Le Clerc, 1729.
- Morrison, Eliza.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2 vols.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and Longmans, 1839.
- Morrison, John Robert. "Review of the facilities existing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specially as regards England and America." *The Chinese Repository* 7, no. 4 (1838): 113-21.
-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London and Macau: Kingsbury Parbury and Allen; and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5-1823.

- Neumann, Karl [Charles Fried]. *München, Hofbibliothek (1803-1829): Verzeichnis der chinesischen Drucke, 1829e.* Munich, 1829. BSB Cbm Cat. 45.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
- Neumann, Charles Fried.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and Armenian, With Notes and Illustrations.* London: The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1831.
- Neumann, Charles Fried. *P. Premare, Marshman und Abel Remusat.* Munich, 1834.
- Neumann, Karl [Charles Fried]. *Asiatische Studien.* 1st printing. Leipzig: Verlag von Johann Ambrosius Barth, 1837.
- Neumann, Karl [Charles Fried]. *Verzeichnis der chinesischen, mandschurischen und mongolischen Drucke.* Munich, 1858. BSB Cbm Cat. 45 c.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
- Pauthier, Jean Pierre Guillaume. “*Vindiciae Sinicæ Novæ*” N°1. Paris: Ernest Leroux, 1872.
- Prémare, Joseph Henri Marie d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Canton, 1728. MSS Orient, Chinois 9259.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Paris.
- Prémare, Joseph Henri Marie d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Canton, ca. 1728. O/C ADD. 11707. British Library, London.
- Prémare, Joseph Henri Marie d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Paris: 1825. CWML MSS 300.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ibrary, London.
- Prémare, Joseph Henri Marie d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Canton: 1830. Cod. Sin. 1, [Guangzhou] 1830.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
- Prémare, Joseph Henri Marie d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Paris: ca. 1830s. O/C ADD. 11708. British Library, London. <https://douglasstewart.com.au/product/premari-notitia-linguae-sinicae> (accessed 2019.07.18).
- Prémare, Joseph Henri Marie d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Malacca: Collegii Anglo-Sinici, 1831.
- Prémare, Joseph Henri Marie d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Translated by James Granger Bridgman. Canton: Chinese Repository, 1847.
- Prémare, Joseph Henri Marie de.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Hong Kong: Imprimerie de Nazareth, 1893.
- Memorandum Respecting Prémare's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20 October 1831. CWM/

- LMS/Ultra Ganges.Malacca, incoming correspondence, box 3, folder 2, jacket B.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Archives, London.
-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nd Chinese Mission at Malacca*. Malacca: Mission Press, 1825.
- Report of the Eleventh Year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Mission Press, 1829.
- Sloth [Robert Thom]. *Esop's [sic] Fables, Written in Chinese by the Learned Mun Mooy Seen-Shang, and Compiled in their present form by His Pupil Sloth* 意拾喻言 . Canton: Canton Press Office, 1840.
- The 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Mission Press, 1827.
- The Ninth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for the Years 1832 and 1833*. Malacca: Mission Press, 1834.
- The 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Malacca: Mission Press, 1828.
- 柯保羅等編，《皕載英華》，香港：三聯書店，2018。

## 二、近人論著

- 李 真 2013 〈馬若瑟語言研究代表作《漢語劄記》之版本流變考〉，《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2013): 118-123。
- 李 真 2013 〈馬若瑟 (Joseph de Prémare, S.J.) 生平、拉丁語漢語語法書及學術成就鉤沉〉，《拉丁語言文化研究》第 1 輯，2013，頁 58-101。
- 李 真 2014 《馬若瑟《漢語劄記》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 真 2019 〈德國巴伐利亞公立圖書圖書館藏《漢語劄記》抄本述略〉，《國際漢學》18(2019): 178-184。
- Brocheux, Pierre. *Missions Etrangères et Langues Orientales. Contribution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à la connaissance de 60 langues d'Asie. Bibliographie de 1680 jusqu'à 1996*. Paris: L'Harmattan, 1997.
- Daily, Christopher A. *Robert Morrison and the Protestant Plan for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 Kua, Paul. “Prémare's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1728-1893: The Journey of a Language Textbook.” *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10, no. 2 (October 2020): 159-200.

- Lundbæk, Knud.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J.: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Aarhus,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
- Needham, Joseph, and Christoph Harbsmeier. *Language and Logic*, edited by Kenneth Robinson. Vol. 7. Part 1. *Science &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Walravens, Hartmut. *Julius Klaproth (1783-1835), Leben und Werk*. Wiesbaden, Germany: Harrassowitz Verlag, 1999.

## Revisiting Manuscript Copies and Published Editions of Prémare's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Paul Kua \*

### Abstract

French Jesuit missionary to China 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 finished drafting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in Canton in 1728 and sent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to Europe shortly after, hoping to facilitate the learn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by aspiring missionaries and interested intellectuals through its publication. But his wish of having it broadly distributed in the West was fraught with difficulties from the start. Almost a century later, after the rediscovery of another original manuscript in the Bibliothèque du Roi, Paris, by French Sinologist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 it achieved a first, albeit very limited, wave of circulation in Europe by way of manual copies made from this original or its reproductions. This was followed by three further waves of wider circulation in the form of printed editions issued successively in Asia in the remainder of the 19th century.

Over the years, scholars from the East and the West have studied various aspects of Prémare's important work. This article closely re-examines three European manuscript copies and three Asian published versions of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as well as related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offers alternative views to past studies by Abel-Rémusat, Henri Cordier (1849-1925), Knud Lundbæk, and Li Zhen 李真, filling the knowledge gaps within them.

The European copies of *Notitia Linguæ Sinicæ* represent samples of the first wave of circulation of Prémare's magnum opus, between the 1810s and the 1840s, starting with the first such copy made by Abel-Rémusat. The manuscript copy now held i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Archives,

---

\* Paul Kua, an independent scholar based in Europe, and an affiliate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ondon, rarely examined by researcher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Being the copy used for the first published edition in 1831, it functioned as the bridge for the second wave of broader circulation. Just as importantly, it also contains valuable insights on provenance and circulation history, and acts as a reliable standard for comparisons with two other known European copies currently held by two leading European libraries.

Specifically, the paper has attempted to: 1) reconstruct the full provenance and provide some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hitherto largely ignored by academic research, of the manuscript copy of *Notitia Linguae Sinicæ* now held by SOAS (CWML MSS 300), referred to here as “Julien Copy A”; 2) re-confirm the identity of the copyist, previously challenged by some studies, of the copy now held by 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 (O/C ADD. 11708), referred to here as “Julien Copy B”; 3) establish the identity of the copyist, contrary to conclusions drawn in a recent journal article, of the copy now held in the Bayerische Staatsbibliothek, Munich, (Cod. Sin. 1, [Guangzhou] 1830), referred to here as the “Neumann Copy”; and, finally, 4) clarify the publication history of and the roles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sometimes misunderstood by certain researchers, the first published edition issued by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of Malacca.

**Keywords:** 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Notitia Linguae Sinicæ*,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Stanislas Aignan Julien, Charles Fried Neumann, Robert Morrison,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study of manuscripts and editions